

影响针刺补泻手法发展的主要因素

● 李 磊^{1*} 尤传香²

摘 要 针刺补泻手法的产生和发展与古代朴素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针刺补泻手法的价值在学而不在于术。数千年来,针刺补泻手法愈演愈繁、纷争不休。追踪针刺补泻手法理论的形成过程,溯本求源,发掘其中的合理内涵,对于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影响 针刺补泻 手法 发展 因素

针刺补泻手法是传统针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各种针刺术式。它强调“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施治原则,认为机体功能虚弱之时,应该采用“补”的针刺手法,而当机体功能亢盛之时,则应该采用“泻”的针刺手法,以达到阴平阳秘、气血调和的治疗目的。所谓“虚实之要,九针最妙,补泻之时,以针为之。”针刺补泻手法把机体的虚实状态与针刺术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传统针灸学中一个颇具特色的应用体系。

对传统的针刺补泻手法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有:

1 道家思想的影响

中医理论的形成直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的影响。何谓道?道是万物的根本究竟,道的统一性贯穿于万物。春秋末年,老子把虚无之道视作世界的本原和规律,万物得道则生。道

家哲学一是体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道无形,道家崇尚自然,认为天道高于人道。庄子云:“不以人灭天。”即不可用自己的喜好去破坏大自然的和谐。大自然的“天籁”之音,是天地万物顺其性情而发出的和声,它反映了宇宙生命的韵律。人只有把自己融化于大自然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才能找到生命的本源。二是对自由个性的推崇。道家认为,万物的存在都是顺其自然的、合理的、真实的,让其按天性存在和发展,则各得其所,如果破坏了万物的天性则各失其所。三是对个体生命的珍惜。老子主张致虚守静,恬淡无为,返朴归真。

《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在其成书的战国至西汉时期,正是道教盛行之际,因而从书名到思想内容,都受到了道家的影响。

《内经》中有关“道”的论述,

继承了老子“道”是世界本原和规律的思想,揭示了客观事物变化的必然趋势。天地万物皆依道而生存变化,把握了道也就把握了天地万物。人必须顺应天地之道而行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就有:“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之说,即只可顺道,不可逆道。

《内经》中针刺补泻手法顺势而治的特性,即是道家思想的集中表现。所谓顺势,即顺应天地自然之势。补法“微旋而徐推之”“若行若按,如蚊虻止,如留如还”“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如待所贵,不知日暮”,手法柔弱轻微,为的是顺应虚证所表现的不足之势,达到“虚则补之”的目的。泻法“切而转之”“疾入徐出”“摇大其穴”,手法力重势猛,为的是顺应实证所表现的亢盛之势,达到“实则泻之”的目的。

在古代,很多著名的医家也同时是道家,他们很自然地将道家的思想运用于中医理论中,从而影响了针刺补泻手法的形成和发展。

* 作者简介 李磊,男,医学博士,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助理教授。

• 作者单位 1.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2.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2 宋儒理学思想的影响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儒家以孔子的言行作为准则,把《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经典,提倡仁义,强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正名、仁政、中庸、重义轻利等思想是儒家的基本观点。

但在早期的医学著作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却不甚显著。如《黄帝内经》中多处论述了恬淡虚无、顺势而治的理论原则,而忠孝仁义之说却极少涉及。

西汉中期以后,因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由于医药的作用与儒家经世治用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接近,所以一些胸怀大志的儒家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选择。正所谓“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经过儒家思想长期熏陶的儒医,在道德涵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其它医家不同的特征。其中“秀才”居多,“举人”、“进士”亦不乏其人,他们具有丰富的经、史、子、集知识,有很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除了熟读圣贤书外,还注重理性思维,凡事求理,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到了宋代,儒医在朱熹理学思想的启发下,“格物穷理”蔚然成风,通过类推,努力将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迈进。他们把“明儒理”作为“知医理”的前提,引儒论医。但理学家们的“穷理”不是为了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认识,而是为了穷尽先验之理,最终仍陷入唯心主义的窠臼。与此同时,宋儒邵雍、周敦颐大力倡导象数学说,于是形成了一股延续几百年的推演

《易》理,附会卦象的文化大潮。针刺补泻手法亦受此文化大潮的影响失去了《内经》时代简朴的特点,变得繁琐而神秘。

针刺补泻讲究男女左右,是宋代以后针刺补泻手法的一大特点。何若愚在《流注指微针赋》中说:“男子左泻右补,女子右泻左补,转针迎随,补泻之道,明于此矣。”明确地把男女补泻与左右针法联系起来。随后,席弘、窦汉卿、徐凤、李梃都大谈“左转为补,右转为泻”,所谓左转,即拇指向前,食指向后,反之则为右转。“左转从子,能外行诸阳,右转从午,能内行诸阴”,所以男子左转为补,右转为泻;女子右转为补,左转为泻。李梃在《医学入门》中根据太极图象,并参照时间因素,进一步明确为:“从子至午,左行为补;从午至子,右行为泻。”因为在十二地支中,子在北,午在南,卯在东,酉在西,由于转向午是顺转,阳气趋盛,故补阳补男;由午转向子是逆转,阴气趋盛,故补阴补女。杨继洲在《针灸大成》中再详作解释:“男子生于寅,……寅,阳也。以阳为主,故左转顺阳为补,右转逆阳为泻;女子生于申,……申,阴也,以阴为主,故右转顺阴为之补,左转逆阴为之泻。”针刺补泻讲究男女左右,显然是和当时盛行的易理结合而产生的。

社会的进步同样使人类理性的思维得到发展,当某种观察和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自然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宋代以后,针刺补泻手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明代,针刺补泻手法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与儒家思想的盛行及“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是密切相关的。

3 象数学说的影响

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说:“每个数都有属于它自己的个别的面目,某种神秘的气氛,某种‘力场’。因此,每个数都是特别地、不同于其它数那样地被想象(甚至说是被感觉)。”而文化人类学家亦注意到,在原始民族中,普遍存在着对某些数的特别崇拜,这种对数的崇拜源于原始思维的互渗观念,形成于思维有所进步和发展的阶段。

中国先民们亦有对数字的崇拜,尤其表现在对数字“九”的崇拜。在古代人们曾十分推崇龟,认为龟是有灵性的动物,龟的长寿不仅使古人羡慕而且对它肃然起敬。在《太平御览·鳞分部》就有:“灵龟者,……能见存亡,明于吉凶”之说,即灼龟占卜可以预知未来吉凶,而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更提到:龟能“明于阴阳,审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福。”正因为龟的神圣、灵性,使人们对龟背上的纹路亦兴趣大增,对此进行推演发挥,成了天地自然“易”的缩影。

从龟甲背部自然纹路中可以看到,它分为九个区域。古人根据这种龟甲图象创立了洛书,推演出八卦。在古代文献,论及洛书时皆称:“神龟出洛水,背负文字”,陈抟传洛书时,下脚注有:“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的字句,这是个典型的龟象。理学大师朱熹在谈及洛书和八卦时,肯定其“盖取龟象”。在《周易·系辞》就有:“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之说,它揭示了先

民对朦胧世界的认识主要是靠“天启”所得,是“圣人取象”之果。

先民们从神灵之物“龟”的背上神奇的“象”,再和天启之“数”相结合,更觉得诡秘和不可思议,感到天启之数“九”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素问·三部九候论》中就有:“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之说。在古代文化观念中,“九”为“数之终也”,是“阳极之数”。三三得九之变,从而演绎出八卦,在这繁琐的占签过程中,九更加显得神圣,并且很快渗透到主观世界的各个方面,于是就有了对九的崇拜。在古人眼里,天地自然之易,统一于九,遂有九州岛、九土、九方、九川、九宫等。同时古人借助互渗的观念,九又与“久”相通,九九之说,则指那些极为繁杂之事。《素问》、《灵枢》、《难经》皆取九九八十一篇,用意不言而喻。

神奇的、令人感到惊恐的自然现象,在古人的心中引起了巨大的震荡,其中不少圣贤者充分运用其超常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对此纵情发挥,从而形成了中国古文化中倍感神秘的观象。这种牵强附会的象数思维方式,直接运用到中医理论体系中,对针刺补泻手法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

另外一个与针刺补泻手法密切相关的数字是“六”字。虽然由于五行思想的盛行,“六”未能获得与“五”相等的地位,但因原始宇宙观的影响,“六”同样成为引人注目的圣数。

在原始的空间意识中,最初只有前、后、左、右四个方位,后来加上代表天地的上、下两个方位,才有了六方立体空间的概念。而来源于六方空间概念的“六”,于《周易》中,却有了更加抽象的意义。《周易》把组成卦的“一”或

“--”称做“爻”,“一”是阳爻,“--”是阴爻,每一卦中都有六个爻,分别是初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上爻。初爻、三爻、五爻是阳位,二爻、四爻、上爻是阴位。六爻之中,上两爻代表天道之阴阳,下两爻代表地道之刚柔,中两爻代表人道之仁义,而天、地、人又称之为“三才”。

“六”又指阴爻。爻之所以命名为“六”与阳爻命名为“九”一样,与《河图》、《洛书》中生数的概念相吻合。古人把一、二、三、四、五当作生数,其中偶数“二、四”之和是“六”,故“六”为阴爻,奇数“一、三、五”之和是“九”,故“九”为阳爻,诚如朱熹所说,“其六者,生数二、四之积也;其九者,一、三、五之积也。”

阳数用九,阴数用六,阴阳组合,九六对举的观念,在明代针刺复式补泻手法的运用上更加广泛。明代医家徐凤的《金针赋》中说:“考夫治病,其法有八,一日烧山火,治玩麻冷痹,先浅后深,用九阳而三进三退,慢提紧按,热至,紧闭插针,除寒之有准。二曰透天凉,治肌热骨蒸,先深后浅,用六阴而三出三入,紧提慢按,寒至,徐徐举针,退热之可凭。皆细细搓之,去病准绳。三曰阳中隐阴,先寒后热,浅而深,以九六之法,则先补后泻也。四曰阴中隐阳,先热后寒,深而浅,以六九之方,则先泻后补也……。”首次把数字九六与针刺补泻手法联系起来,补法用九,泻法用六。这种补泻针法从金元起,一直主导着临床,影响至今仍存。

4 崇经尊古思想的影响

宋以后至明代,针刺补泻手法层出不穷,流派纷呈,医家们都对此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见解,针刺补

泻手法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拾遗杂论》中说:“针法浑是泻而无补,妙在押死其血气而不痛,故下针随处皆可。”首次提出针刺浑泻无补的观点,其所用的方法以泻血为主,泻血部位以委中穴为主,辅以“随处皆可”疏通气血而止痛,而对虚证患者却极少采用针刺治疗。

明代医家汪机宗丹溪之意,亦认为针法浑是泻而无补,并加以发挥。其理由有二:一是以针具而言,他认为“针乃砭石所制,既无气又无味,破皮损肉,发窍于身,气皆从窍出矣,何得为补?”即针具乃铁石所制成,无气无味,故不具补的作用。所以他引“经曰:气血阴阳俱不足,勿取以针,和以甘药是也”之说为证,即虚证患者治疗之时,只能用甘药,不能用针。二是从针刺的作用而言,他认为针刺不能补人以气味,只能调节人体的气机。气盛则泻其气,气滞则宣其气,气停则移其气,这些都是属于泻的范围。而经典著作中所论及之补,是以祛邪扶正而言。所以他说:“夫泻,固泻其盛也,于补亦云,宣不行之气,移未复之脉,曰宣曰移,非泻而何?”“经中须有补法,即张子和所谓祛邪实所以扶正,祛旧实所以生新之意也。”另外因为他崇尚《内经》、《难经》之说,所以对宋以后的复式针刺补泻手法多持否定态度,如他在评论“三才法”时说:“赋言内(纳)针作三次进,出针作三次退,与经文徐而疾,疾而徐之意,不大相合,且针出纳而分三才,肉厚穴分,用之无碍,肉薄去处,法将何施?”此乃:“证之于经,则有悖于经,质之于理,则有达于理,彼以为神,我以为诡,彼以为秘,我以为妄。”而对于补泻分男女早晚之说,

则认为：“卫气之行，但分昼夜，未闻分上下也，男女脏腑经络，气血往来，未尝不同也，今赋所言如是，饮似无稽之谈，安可为法于人哉。”“考之素难，男女脏腑经络穴俞血气，昼夜周流无不同，今赋言午前午后，男女补泻颠倒错乱如此，悖经旨也甚矣”。“古人补泻之法……何尝有所谓男子左泻右补，女子右泻左补也哉……后人好奇，广立诸法，徒劳无益。”在形容徐凤的《金针赋》时则说：“合理者少，悖理者多，错杂紊乱，繁冗重复。”

同时期的高武对于针刺补泻手法，亦以《内经》、《难经》作为论证的依据，凡是与《内经》、《难经》相违背的，均不赞同。如他对针刺补泻有男女气血上下之分，认为“因非素难意，亦不必然也。”而对针刺补泻人体左右有别，更认为

是：“已非《素问》意……谬之甚也。”对于徐凤《金针赋》里所提出的复式补泻手法，则认为是“巧立名色，非素难意也”；是“求针之明，为针之晦。”连著名的针灸医家杨继洲也认为《金针赋》中补泻分男女早晚之说不可取。

在明代，针灸学术的昌盛带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同学说和流派的涌现，以及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无疑影响了针刺补泻手法的发展。

从上可以看出，原始、朴素、直观的哲学思想是针刺补泻手法产生的理论基础，而阴阳学说和象数学说的兴起是促使针刺补泻手法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针刺补泻手法是古人由直观思维走向形象思维，由形象思维上升到象数思维

的产物，其中显著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特征。

参考文献

- [1] 薛公忱. 医中儒道佛[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9: 1.
- [2] 吴桂就. 方位观念与中国文化[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0: 1.
- [3] 林殷. 儒家文化与中医学[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11.
- [4] 孔令宏. 中国道教史话[M]. 石家庄: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 10.
- [5] 薛公忱. 中医文化溯源[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3: 10.
- [6] 马伯英. 中国医学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5.
- [7] 刘长林. 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2: 12.
- [8] 李 锄, 赵京生, 吴继东. 针灸经论选[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3: 1.
- [9] 赵京生. 针灸经典理论阐释[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0: 12.

医 论

新病兼补 久病专攻

凡病皆宜攻也，而有时兼补者，以其内虚也。内虚之义有二：一为内之正气自虚也；一为邪气在表，其表为实，邪未入里，其内尚虚也。新病邪浅，加补气养血于攻病剂中，故病去而无余患；若久病正气受伤，邪已内陷，一加补药，便与邪值，而攻药不能尽其所长矣。故华元化、张仲景、孙真人书中，治久病诸方，反重用攻击，不佐以补者，为邪气在里故也。

此法率以丸而不以汤者，急药缓服也。待至攻去其邪，里邪势杀，而后以补药尽其余焰，故效捷而亦无余患也。后人识力不及，每谓风寒初起，正气未亏，无庸兼补，更有谓邪气在表，兼补即引邪入里者，往往攻药不得补药之力，邪气纠缠不尽，或攻伤正气，邪转内陷者，其弊由于不识古人急补之义也。及治久病，邪气胶固，反夹杂补药，更有专补不攻，谓正气充足，病自渐瘳者，殊不知邪气盘踞于里，补药性力皆走里而守中，其气正与邪气相值，不能与正气相接也，往往使邪气根株愈牢，坚不可拔，迁延不救者，其弊由于不识古人急攻之义也。大凡攻补兼施者，须详虚处有邪无邪，为第一要义；虚处有邪，则补虚之药，不免固邪矣。此施治之最棘手者。古人补母泻子之法，殆起于此。如肺气既虚，而又有风热或痰饮之实邪，此宜补脾而攻肺，不得补肺与攻肺并用也。

——摘自清·周学海《读医随笔》

心欲软 肾欲坚

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盖心于象为离，肾于象为坎。坎之明在内，以刚健而行之于外，故欲坚；离之明在外，当柔顺而养之于中，故欲软。软者，必以咸；坚者，必以苦。咸从水化，苦从火化也。夫坎水润下，愈下则陷矣，故以行为尚。《易》曰：行有尚吉，往有功也。离火炎上，愈上则焚矣，故以蓄为吉。《易》曰：离利贞亨，畜牝牛吉也。然则所以坚之、软之者，固欲其水上、火上，而成心肾交通之妙坎！

——摘自清·尤怡《医学读书记》